“人民性”融入侦查工作研究

胡承武 丁凤岭

长江大学 湖北荆州 434023

DOI: 10.12238/jief.v7i7.15798

[摘要] 侦查工作要站稳人民立场,既要以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又要使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性”融入侦查工作在对侦查权的监督过程、自愿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效,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和运动式执法等四个方面“人民性”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要规范行使侦查权,就要明确权限边界、秉持无罪推定原则、自觉接受司法审查、合法合理使“人民性”更好地融入侦查工作等,从而有效提升侦查工作的质量与成效。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人民性”;侦查工作

"Affinity to the people" is integrated into the study of investigation work

Hu Chengwu Ding Fengling

Changjiang University Jingzhou City, Hubei Province 434023

[Abstract] Investigative work must uphold the people-oriented stance, ensuring bo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riminal facts through eviden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rights of litigation participants. Since the new era began, the integration of "people-centric principles" into investigative practices has yielded notable achievements in supervising investigative powers and applying leniency for voluntary guilty pleas. However, four aspects—coercive interrogation methods, campaign-style law enforcement, and other illegal evidence-gathering practices—require improvement. To standardize investigative authority,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adhere to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principle, willingly accept judicial review, and legally integrate people-centric approaches into investigative processes. These measures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vestigative work.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the rule of law; People-centric principles; Investigative work

根据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情况,一些地方政法干警“微腐败”、“轻违纪”等问题比较突出。2021年中央第十四督导组认为四川政法队伍建设存在一是公正执法司法的基础还不牢;二是从严治警还不全面;三是主动担当作为的事业心精气神还不够。具体到侦查领域,这些问题反映出“人民性”原则尚未得到充分贯彻。进入新时代以来,侦查机关更加注重将“人民性”融入工作实际,并取得一系列新进展。当前有必要系统总结新时代侦查工作中贯彻“人民性”的有效做法与显著成效,同时深入分析部分工作中“人民性”落实仍不彻底的原因,从而推动侦查工作更全面、更深入地体现“人民性”。

一、“人民性”融入侦查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存在着不同的表述。例如,人民群众都能感受到个案的公平正义、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仰与遵守才有法律权威、人民的愿望与权益是依法治国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保护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是公民的本能、法治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民,不能剥夺人民的社会主体的地位等。还有“治国无常,利民为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亦是江山”等。

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以审判为中心,侦查工作收集证据要准确与及时地确定犯罪事实,然后才能正确适用法律。

(一)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包含人民性的精神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能节约时间,提高办案质效。在侦查实践中,对于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通常不予逮捕,并主动邀请律师及时参与;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重大案件中,则多采取逮捕措施,并对律师会见予以严格限制;对于职务犯罪案件,通常适用监察留置措施,律师会见受到约束。湖北省检察院、法院、省公安厅、省国家安全厅、省司法厅联合颁布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分别获得最高30%、20%和10%的量刑减让。山东省济南市亦出台类似规定,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最大可减少基准刑的35%,审查起诉阶段为25%,审判阶段为15%。

(二) 加强对侦查权监督的人民性

为增强公安司法工作的群众基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不断健全群众监督机制。辩护人的作用与公检法机关职权不同,辩护人一般思考问题是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事实和法律的

角度对抗公检法机关的职权行使。例如,辩护人刘胡乐、杨松在“杜培武案”的辩护词中的辩护意见指出:第一,收集行为违法,刑讯逼供变相存在,且有罪供述之间无法排除矛盾;第二,没有证据证明杜培武有故意的出轨行为,所以杀人动机不能成立;第三,被告人杜培武没有作案时间,没有收集到作案工具,只有没有查证属实的言词证据去证明杜培武的杀人行为。《刑事诉讼法》通过明确辩护人的权利与义务,并规范行权程序,确保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即可获得充分保障,部分权利效力还可延伸至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促使侦查机关必须重视辩护意见。具体包括: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与质证等权利;优化辩护人参与诉讼程序的机制;要求侦查机关对侦查终结前犯罪嫌疑人或律师提出的无罪、罪轻意见依法进行核实;法庭审理阶段,所有关涉罪重罪轻、有罪无罪的证据均须经当庭举证与质证;同时完善了依申请及办案机关指定的法律援助机制。正如哈佛大学学者德肖微茨所言,“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是抵抗权力压迫的最终屏障。”辩护人不仅代表着被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也承担依法监督侦查行为的行使是否合法。规范的侦查程序也为人民对最终判决的社会信任打下了基础。

(三) 数据侦查融入人民性

大数据是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何得到、研判和运用数据是相关工作人员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也是群众参与侦查工作的简便途径。在新时代背景下,侦查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以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局为例,该局通过犯罪数据分析与预测系统,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持。该系统综合运用犯罪理论分类、地理信息标注和预测建模等方法,实现了对特定时段和区域犯罪发生概率及类型的精准预测,从而显著提升了犯罪预防与打击的效率,确保了会议顺利举办。由此,大数据获取、研判和运用是侦查手段信息科技化的标志,有利于调查收集证据、从而查清犯罪事实,最大限度地办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案件。

二、“人民性”融入部分侦查工作不够彰显

部分侦查人员没有学习新时代数字技术和新法律的观念和慎终如始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理念,导致不会运用数字技术,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由于其认知存在偏差,往往难以科学、合理地还原案件事实,直接影响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障。此外,部分人员对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的条件理解不到位,对讯问程序中明令禁止的非法行为认识不足,未能充分把握立法精神与程序正义要求,以致在个案中过度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这类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侦查工作中的“人民性”。

(一) 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晒、烤、冻、饿等方式都是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的变相刑讯逼供,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难以忍受的双重痛苦,作出的供述违反其真实意愿。例如,在湖北仙桃法院审判的“范某和林某刑讯逼供案”中,被告人范某为获取犯罪嫌疑

人彭某的口供,明示或默认林某等人用拳头殴打彭某面部、用皮带抽打其腹部胳膊等处、用水泼脸、以及利用脚链使其身体悬空等。上述行为导致彭某身体受创,经鉴定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所谓威胁、恐吓,是指通过暴力或言语手段对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合法权益进行胁迫,例如扬言不予配合将面临从重处罚、向其年幼子女散布所谓“犯罪事实”、阻挠探望病重父母,或要求家属到案等施加心理压力的行为。此外,以有违社会公德或非法手段进行引诱、欺骗,同样属于非法取证范畴。我国司法明确禁止“车轮战”和疲劳审讯等变相折磨方式。例如,在“某某贩卖毒品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需补强,侦查人员遂多次以“法院已有初步判决意见,认罪可获从宽处理、早日释放”、“拒不认罪将加重刑罚”等言辞诱使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然而在二审期间,法院发现该供述与案件具体细节存在矛盾,最终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改判被告人无罪。学者季宗堂指出,“审讯本质是一门科学,是控辩双方的心理博弈,须讲求虚实结合、软硬兼施的策略艺术。”正因为讯问过程极易掺杂威胁、引诱或欺骗,加之犯罪嫌疑人处于弱势环境,此类非法讯问行为更易发生。因此,必须对讯问活动进行全面且严格的程序规范。

(二) 运动式执法对相关人员的权益侵害

运动式执法(如“严打”)是一种通过集中资源、自上而下动员以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执法模式。其典型特征在于重实体而轻程序,依靠行政力量迅速推进办案进程。例如,在“呼格吉勒图案”中,正处“严打”期间,公检法机关为追求从快破案,打破常规诉讼程序,从案发至执行死刑仅历时两个月,办案过程呈现明显的“流水线”作业特征。在“赵作海案”中,本应因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却由于超期羁押专项治理活动的推进压力,导致程序被简化、证据标准被放松,最终酿成错案,是典型的程序不正义造成了实体结果的不正义。“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由于承办案件的机关承受不住舆论审判,侦查人员认为聂树斌与作案人有某些相似的特征,便迅速将其有罪推定,展开有罪推定式的讯问。诸如此类严打型的运动式侦查治理虽有一时震慑之效,但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形势,也难以精准打击犯罪。

(三) 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比较严格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强化了对司法权运行的规范,促进了程序性权利的实践落实。学者宋英辉认为,案件特质、权利侵害程度和侦查人员主观心态等是确定非法证据的标准。龙宗智则提出了“区别对待”的观点,认为通过威胁手段获取的口供不应一概予以排除;若威胁内容涉及损害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的重大合法权益,则此类证据因违背司法伦理底线而不应被采纳;若讯问手段未超出合理范围,则可认定为类似合理手段。排除技术侦查获取的非法证据,司法实践运用较少。学者田毅平认为,非法技术侦查手段获得的材料应认定为非法证据,否则会损害侦查法律效果与司法制度,但没有必要必须强制排除技术侦查手段取得的录音录像等材料,被认

为是瑕疵证据,是可以补正的,一般可被视为一种线索,不直接作为证据审查,可免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以上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比较严格,不利于约束刑罚权和人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三、随时随地站稳人民立场

新时代以来,经过再审程序依法纠正60余起重大刑事冤错案件。诸如张氏叔侄强奸案、呼格吉勒图案、陈满故意杀人案等全国关注的案件相继得以改判,有效增强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一)全面深刻贯彻“人民性”的核心内涵。侦查机关要通过自学、教育培训等形式,促使侦查人员全面深刻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人民性”的核心要义,用正反两方面有关侦查工作的“人民性”案例宣传好的典型,批判不好的做法,用“人民性”武装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头脑,赋能侦查工作。

(二)侦查权要被关在法治的笼子里。侦查权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公权力,与人民的私权利之间出现冲突的可能性较大,人民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显然处于劣势地位。第一,要对公权力进行立法规制。建立分类分级的数据管理制度,完善权限审批与权力制衡机制,数据敏感度越高,审批流程应越严格,权力制衡应越严厉。第二,侦查机关应在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內收集和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始终坚持合法、合理、公开、受监督的行权原则。正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卡多佐所言,程序正当是保障司法纯洁性普遍所认可的方法。第三,侦查机关要理解和把握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种类相关规定。

(三)侦查工作要自觉践行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约束公安司法公权力的基本准则,是国际条约中明确规定的保护人类基本人权的准则,既体现于刑事事实法中的罪刑法定,也贯穿于刑事程序法的制度设计。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正是无罪推定精神的体现。侦查作为审查起诉与审判的基础,必须恪守该原则:在被追诉人经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之前,其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侦查机关应依法保障其各项合法权利,给予其作为普通公民应有的尊重。

(四)侦查工作要受司法审查

通过规范公权力,保护私权利。控辩双方法律地位诉讼权利义务相同或对等,是司法改革的最终方向。司法审查的实质是司法权力制衡侦查权。第一,事前审查。检察权要着重监督逮捕权;第一,事中审查。诉讼参与者受到侵犯,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控诉;第二,事后审查。例如,法院声明侦查机关采取的违法侦查措施无效。司法审查能够从外部有效地制衡侦查权,保障侦查工作按合法程序和实体规定运行。

[参考文献]

- [1]戴艳军、段中卫.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3)
- [2]张文显.新思想引领法治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J].公民与法(综合版),2017,(11).

[3]张恒山.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3(2).

[4]陈战胜、沈立崑.习近平法治思想述评[J].党政干部学刊,2014,(8).

[5]朱新力.习近平法治思维新突破与新特征[J].人民论坛,2014,(11).

[6]赵丽华、秦雪姣.习近平的法治思想研究[J].理论观察,2018,(2).

[7]王健.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路径初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8).

[8]郗伟明.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依法治国[J].前进,2018,(1).

[9]孙德龙、邢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立足点和理论创新[J].理论学习,2017,(4).

[10]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J].政法论坛,2022,(3).

[11]李辉.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观深刻内涵 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J].奋斗,2015,(3).

[12]杜艳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整体性特质研究[J].民主与科学,2022,(4).

[13]宋玉波.宪行天下 政治昌明 政党“束手束脚”可让国家少走弯路——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新意[J].人民论坛,2013,(5).

[14]沈惠章、葛启斌、范袁媛.浅谈刑侦体制的深化改革[J].公安论坛,1997,(11).

[15]彭玉伟.大侦查体制改革及其实践介评[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5).

[16]李双其.再论公安侦查机制改革[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17]郝宏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积极推进小案全面侦查——以江干、晋江、西安小案全面侦查实践为范本[J].中国刑事警察,2018,(6).

[18]蔡萌生.实战、理论、改革:中国刑事侦查现状与发展趋势——新时代刑事侦查改革理论与实务热点问题研讨会综述[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9(3).

[19]陈兴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考察:以刘涌案和佘祥林案为标本[J].浙江社会科学,2006,(6).

[20]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J].中国法学,2007,(3).

作者简介:胡承武(1970—),男,湖北荆州人,长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通讯作者:丁凤岭(1981—),女,湖北荆门人,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长江大学重点教研项目研究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刑事诉讼法学课程研究与实践(编号:JY2022003)。